

“内外兼修”提升铁矿石进口安全度



中国市场学会理事
经济学教授

张锐

成立不到半年的最年轻央企中国矿产资源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矿资源”)日前与国际著名的三大铁矿石生产供应商澳大利亚的力拓与必和必拓以及巴西的淡水河谷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此举被视为中国钢铁行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可能为中国铁矿石进口打开一扇新的安全视窗。

踏着国际大宗商品在美联储本轮货币政策收紧之前上演的一波“牛市”节拍,铁矿石价格扶摇直上。仅就中国而言,2021年进口铁矿石价格就同比飙升55%,即便是进入今年,美联储以及全球央行猛踩货币政策刹车,也没能阻挡铁矿石继续冲高的强大惯性,中国进口铁矿石到岸价一度摸到1314美元/吨的年度高点,虽然之后有所回落,但前10个月,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均价依然高达1213美元/吨。

中国钢铁产量已连续20多年居全球首位,而且期间年年扩量增产。2001年中国粗钢产量1.52亿吨,2011年增至6.85亿吨,2021年更是稳稳延续了连续五年的两位数产量势头,全年钢产量达到10.323亿吨。与此相对应,我国进口铁矿石用4年时间突破了2亿吨进口量,用3年时间突破6亿吨,然后又用5年时间最终突破10亿吨。中国成为了全球最大的铁矿石消耗国,对海外进口铁矿石的依赖率高达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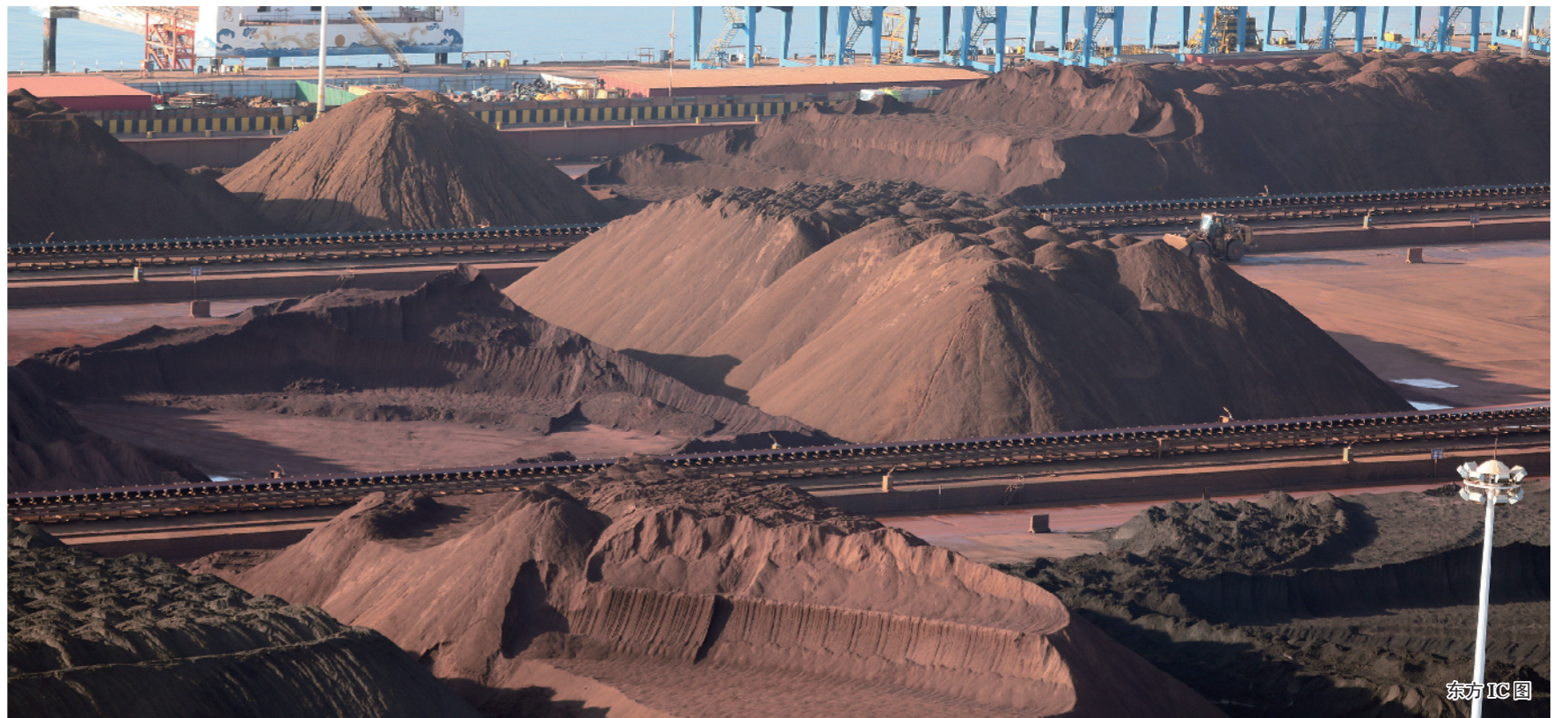
一方面是铁矿石价格持续走高,另一方面是由中国钢产量不断放大而带动的铁矿石进口放量,中国因此付出的超额采购成本抑或是遭遇到的外汇损失不言而喻。2021年,中国累计进口铁矿石11.24亿吨,均价164美元/吨,且基本上是从澳大利亚与巴西进口,等于中国高

达1843.3亿美元的铁矿石进口用汇基本被这两个国家瓜分。同时对比发现,以2020年全年进口铁矿石均价101.7美元/吨计算,当年中国进口铁矿石11.7亿吨,对应金额约1189亿美元,也就是说即便在进口量有所减少的情况下,2021年中国也因铁矿石价格的上涨多支付外汇654.3亿美元,增幅高达55%。

更严重的是,全球铁矿石资源主要集中在巴西的淡水河谷、澳大利亚的力拓和必和必拓以及福蒂斯丘四家企业手中,铁矿石价格上涨在进出口企业之间引起的利润分化程度简直匪夷所思。由于铁矿石价格上涨的成本吞噬,中国钢铁行业利润率常年不到2%,而全球四大铁矿石巨头的利润率却总是高居400%左右的位置。拿2021年来说,全年中国大中型钢铁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550亿美元,但同期必和必拓与力拓两家企业的利润之和就高达590亿美元。残酷的对比数据清晰揭示了铁矿石价格上涨对于中国企业的掠夺与戕害。

的确,需求因素是导致铁矿石价格走高的重要牵引,但作为黑色金属类的大宗商品,铁矿石价格理应基本由期货市场决定,就像国际铜价主要是由LME铜期货价决定,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大豆期货和玉米期货决定全球大豆和玉米买卖价格标准一样。然而,铁矿石期货目前只能算一个不是十分成熟的品种,全球范围内有印度商品交易所ICEX和印度多种商品交易所MCX联合推出的铁矿石期货、新加坡交易所的掉期交易基础上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以及大连商品交易所推出的铁矿石期货,但由于各自指数的参考基准不同且标准各异,同时三大市场之间处于割裂状态,最终释放出的期价很难得到铁矿石供应商与采购商的一致认可。

由全球领先的能源和金属信息提供商普氏能源公司发布的普氏铁矿石指数采集的价格虽然反映出的是中国主要港



东方IC图

口铁矿石CFR(成本+运费)现货价格,但其数据样本多为“活跃”参与现货交易的小规模钢企和贸易商,而不是矿山和大型钢厂,不仅代表性欠缺,而且价格指数编制方式也不透明,背后利益盘根错节。

因此,矿石交易价格最终还是采取“长协”定价机制。这种机制就是全球三大主要钢铁生产国中国、日本和韩国的钢铁企业在各国行业协会组织牵头下推出行业代表与铁矿石供应商进行价格谈判,双方商定出长期价格。

不过,长期价格实际敲定的只是一年内的铁矿石进出口“首发价格”,而且最终结果是年年谈判年年价格水涨船高,“首发价格”后的市场价格也是涨多跌少。不可思议的是,国际铁矿石谈判历来遵循与贯彻“跟随”潜规则,即只要铁矿石生产商与谈判的任何一方达成了长期合同价格协议,全球其他钢铁企业都跟随这一价格。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由于日本在必和必拓和力拓等矿山中持

有不少股份,几乎每一次谈判结果都是铁矿石供应巨头率先与日本钢铁企业订立“城下之盟”,中国企业最终只能无奈“跟随”。因此,直到今天,虽然中国占据着世界铁矿石最大进口国的位置,但依旧对铁矿石定价没有话语权。

今年7月成立的中矿资源或许能够改写上述尴尬局面。一方面,未来中矿资源将代表国内钢铁行业与海外铁矿石生产商进行谈判,牵头实施铁矿石集中采购制度,既一定程度上提升我国对于铁矿石的议价能力,也有目的地对国内进口铁矿石资源进行合理的行业组合与配置。另一方面,中矿资源接下来有可能与海外铁矿石供应商进行实质性的战略合作,如双方在资本层面展开与推进交叉持股、共同开发第三方铁矿石及其他矿产资源,以及为合作行业共同制定绿色低碳技术等资源优化方案和标准等,最终形成一定程度的利益共同体,从而为铁矿石进口配备出可以解压的产业

服务链与安全供应链。

当然,需要客观看待的是,虽然中矿资源能够对外提升铁矿石价格博弈的话语权,并可能构造出对国内铁矿石进口的有利格局,但其一己之力能否改变既定而顽固的国际谈判规则,以及能在多大范围内与多强深度上引起国际铁矿石供应商的合作共鸣尚待观察。基于此,我们在向海外伸出商业力量长臂的同时,更需要在国内从产业布局与资源利用层面拓展可以实现治本的有效路径。

一方面,要继续推动钢铁行业“去产能”,通过产业优化降低铁矿石的使用强度。虽经过多年的产业整合,但国内钢铁行业的集约度依然不高,排名前十的钢铁企业产量占比目前只有41.5%,低于全球60%的行业集中度水平,因此,有必要继续推动行业横向资源整合,同时推进以大型钢铁企业为核心、集合上游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客户的跨行业、跨地区的纵向联合,以显著的范围经济

与产业规模化提高铁矿石的边际产出率。在此基础上,除了少量特种钢材外,坚决禁止其他粗钢生产的增量投资与建设,推动钢铁行业的产品结构调整与升级,提高铁矿石的利用率。

另一方面,要有效利用存量废钢资源,构造出对增量进口铁矿石的替代强度。全球范围内有以铁矿石为基础原料的高炉长流程炼钢和以废钢为基础资源的新型电炉短流程炼钢,像美国的短流程炼钢产量可达70%,欧盟可达42%,但我国90%采取的是长流程工艺方式,短流程炼钢产量远低于30%左右的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目前多达近3亿吨的废钢资源对粗钢产量的贡献率不到20%。为此,需要加大电炉钢工艺技术的研发与升级力度,同时通过支持平台集中收储、厂商责任界定等手段彻底改变废钢回收小、散、乱的特点,实现废钢资源的应收尽收与应用尽用,最大程度实现对铁矿石增量进口的替代。

促进共同富裕需完善制度保障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
数字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

盘和林

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增进民生福祉。报告指出,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坚持多劳多得,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取得了历史性进步,全方位跃升,从消费结构来看,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耐用品消费需求达到饱和状态,创新性产品、文娱产品、医疗保健产品消费处于需求增长阶段,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阶段。

缩小收入差距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期,国内消费需求已经趋于饱和,需求增加,产业进步、经济增长更多依赖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因此,通过“限高、扩中、提低”,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是鼓励创新,增强经济发展韧性的必要选择。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提高经济发展韧性。消费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之一,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起着压舱石的作用。尤其是疫情以来,我国面临着内外发展的双重压力,保障国内消费,是实现内外循

环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可以促进社会总体消费,提升居民的购买能力,扩大市场消费规模,增加市场消费潜力,进而带动产业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的提升,促进了需求的多样性和总量的增加,推动消费升级,同时,提升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又倒逼企业产品质量提升,进而提升企业的产品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利于推进区域融合发展。当前区域融合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城乡的融合发展,城乡融合发展难题的关键就在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有助于促进欠发达地区人员返乡就业、返乡创业、返乡建设。

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助于人力资本累积,提升经济发展活力。经济增长依赖于人力资本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会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教育投入,这将从总量上提升我国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全社会的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增加就业的同时,又能反哺产业的发展,提升产业的生产效率和研发效率,并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收入。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要促进共同富裕,收入分配就要有秩序,财富积累要合规。具体而言,财富积累机制应该从两个层面来推进:一是道德层面,鼓励先富带动后富,让功成名

就的带头人回到乡村,回到落后地区,带动经济落后地区找到致富路径,实现脱贫致富,要在舆论上弘扬,政策上支持这些先富带动后富的积极行为,形成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氛围。

二是法治层面,以法治化、市场化激励的方式,来推动共同富裕。比如深化收入分配机制,在税收制度上推进削峰填谷,让高收入者多缴税,低收入者少缴税,工资税可以考虑同步于通胀率;完善社会托底政策,通过社会保障制度来给低收入者兜底,防止因病返贫,也通过健康、教育的投入,提高人民体质,从长期看,这些投入都将转化为财富和生产力。

在这两个层面,应该以法治规范分配制度为主,以道德引导共同富裕为辅。而在法治层面,税收改革和民生保障改革需要双管齐下,因为从财政层面,税收改革关系到政府收入,而民生保障则关系到政府支出,收支平衡,才能从长期引导分配制度改善。也可以从道德和法治层面进行组合引导,如通过免税来激励慈善捐赠等。

但是应当特别关注的是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经济发展韧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科研工作者、国防、军队等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人才,应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通过精细化、个性化的税收方式,避免打击相关从业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比如采用专项附加扣除的方式,将整个家庭成员的收入状况考虑在内。

不容置疑的是共同富裕的核心依然在于提低和稳,适当增加高收入群体的税负,而从分配结构上看,分配应该更

多倾向于知识经济和科技创新,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来提升知识创新的价格,激励和引导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从分配内容上看,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赚更多的钱,以此壮大中等收入群体。

完善制度保障

除了道德和法制引导,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更要完善制度保障。税收方面,要完善税收分配制度,优化税收结构,提高直接税的比重,相比于间接税,直接税是在最终消费环节征收的,对收入的调节力度更大,因此,应当利用好直接税的工具,加大对偷税漏税等人员的惩罚和告诫力度,通过失信人黑名单、限制从业等,起到对大众的示范效应,营造公平分配的氛围,合理收入、合法缴税。除此之外,房产税税收制度、

遗产税和赠与税等财产性税收在削弱财富的代际传递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财产税或者慈善、捐赠等第三次财富分配的方式,对形成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起到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社会保障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保基本、全覆盖、多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其中涵盖了就业、社保、养老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应该根据现有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促进就业,同时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缩小城乡间、行业间和地区间保障待遇差别。其次,增加社保兜底面,增加社保覆盖面,完善医保制度,增加健康投入,防止“返贫”现象的发生,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率,降低人力资本的折旧率。最后,发展健康产业、养老产业,既能保障老年人生活,提升老年人健康水平,又能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并为年轻一代减轻负担。

公共服务方面,要促进公平正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公平,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内涵,不仅能够改善社会预期,更能提升居民的消费倾向。一方面,要不断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通过数字化技术、简政放权的政策,不断促进公共服务模式的创新和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加大普惠教育保障,改进职业培训,健全多主体、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完善三位一体的医疗保障体系。

最后,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建立在现实国情基础之上,统筹民众与社会需求,把保障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避免纸上谈兵、空想主义,要在提高经济发展韧性,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保障水平。同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公共服务建设的经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陷阱。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并获准开业,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堡镇支行 业务范围: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并由你总、分行机构编码: B0015S231000219 授权的金融服务业务。

许可证流水号: 00855277

批准日期: 2022年11月11日 发证机关: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机构住所: 上海市崇明区堡镇中路365、367号 上海监管局

邮政编码: 202157 发证日期: 2022年11月18日

电 话: 59416182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